

P 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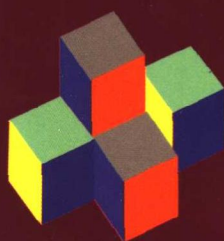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

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

[加拿大] 罗伯特·W. 考克斯 著

林 华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
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

[加拿大] 罗伯特·W. 考克斯 著

林 华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opyright © 198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简体字版 © 2004,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 / (加) 考克斯著；林华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5

书名原文：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ISBN 7 - 5012 - 2280 - 0

I. 生... II. ①考...②林... III. 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0231 号

图字：01—2002—0264

书 名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
——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
Shengchan、Quanli he Shijiezhixu
——Shehuiliang zai Dizao Lishi zhong de Zuoyong

责任编辑 周宇君
责任出版 夏凤仙
责任校对 戴文达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 1/16 24¼
字 数 38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专家委员会

袁 明 时殷弘 秦亚青
王缉思 阎学通 倪世雄

编辑委员会

姚东桥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勇 王 联 于铁军 张小明
潘成鑫 袁路明 周宇君 夏力宁

本书译者

林 华

总序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

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惟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编译的这套书

中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源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 1991 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論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担纲这一套书翻译工作的主力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中已具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多次赴欧美日发达国

家深造和在外讲学、交流的经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体悟，既来自于书斋，亦得之于实践。翻译原著，其实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绝不是粗通一些外文便可对付得了的；要编辑出版成书，也有种种不易。直至今日，大部分译稿都已脱手之际，译者仍对文稿中的一些专门用语苦思冥想。因为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时确实无法将西方大师们思考的神貌用完全相符的中文语词表达出来。“难哉译事”，难是难在“神”上，而非“词”上。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受过两种文化的教育，现在又都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执教，他们在实践中交融了两种文化的优长，更深感要让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了解西方原著的必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有了这一套书。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的。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视野开阔，既看到了世界的过去，也想到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勤恳敬业，是支持我们完成翻译这套书的重要精神支柱。

袁 明

2002年10月

序 言

本书旨在从生产的权力关系这一角度出发，对社会和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关系进行研究。劳动是一项根本性的活动，影响着一系列其他重要的人际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组织。书中的研究以此作为大前提，在它的指导下对劳动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的概念和论点。因此，本书建议的不仅是对劳动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对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形式的研究方法。

我与杰弗里·哈罗德协作撰写一套四卷丛书，每人各写两本，本书即这套丛书中的第一卷。它建立了所有四卷共同使用的概念框架，也包括了一些历史和事实的例证，用以体现关键的概念和论题，但不是为了对它们进行详尽无遗的说明¹。书中对生产、国家和世界政治经济这三个层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²。因此，可以把此书看做对全套丛书的概述或介绍，其中重点强调了此项研究对国家与世界秩序的政治经济体制今后可能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书中先是把世界生产这个整体分成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格式，称为生产的社会关系方式。然后，对于每一种方式的发展动态、各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受到国家和国际力量的性质及活动的影响分别进行了探讨。本书以后的三卷则对生产关系的不同格式进行了更加深入彻底的分析。在研究过程中，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具体方式都被当做莱布尼兹的单子式的结构，自成体系，各有自己的发展潜力和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对于社会和世界秩序中权力问题的研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研究以生产领域为起点，从这一领域中向外展望。当然，这样的观点有失片面。为了做到更为全面，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国家的形式，并就世界秩序的各种结构进行设想，而这样的结构既包

括生产关系的格式，也包括了国家的形式。这正是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³。

后三卷各自处理一组单子式的生产关系方式。杰弗里·哈罗德所著的第二卷题为《权力、生产和不受保护的工人》。该书讨论了以资本主义作为发展动力的社会中的生产关系的各种从属性方式，其中把较先进的和不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包括了进去。第三卷也是出自杰弗里·哈罗德之手，目前暂时定名为《稳固工人：组合主义的社会关系》。书中探讨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方式和稳固工人的情况。这样的工人享有相对优越和稳定的条件，“稳固工人”的称谓即由此而来。我将负责撰写第四卷和第二卷，对于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研究，主要借鉴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还有其他被称为“实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在任何社会中，这些单子式的生产关系方式都是几种同时并存，相互联系。乍看之下，以它们作为基础来展开研究似乎有点奇怪，因为这类研究大多是以国家或社会为框架的。但是，我们这项研究采用的方法就是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着手。这套丛书对各组单子式的方式分别在各卷中进行介绍，以表明它们在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中的联系，和它们在全世界生产体系中的位置。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社会的状况——第二卷是从底层的角度，第三卷是从上层的角度。第四卷中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二、三两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一样，也采取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不同格式这一角度。四卷各成一统，可以单独阅读，又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相关。

杰弗里·哈罗德和我密切合作，历时经久。我们共同努力，发展出了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一概念，并把它应用于这套丛书中讨论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方式。我俩也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些论点。尽管未经交流磋商，但由于彼此十分熟悉对方的思路，结果这些独立提出的观点和我们共同的核心思想都基本一致，相去不远。我们各自负责撰写这套丛书中的两卷，目的就是为了一方面维持整个研究的概念上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又允许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论述其中的一部分。

在此书准备付梓之际，我对杰弗里·哈罗德在知识和道义上对我的帮助铭感于心。15年来，我就此书包含的各种观点同他频繁讨论，往来不绝，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他的许多想法和观点，把它们融入了我自己的思想。知识协作的成果莫过于此。此外，在这段时期内，对于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和冲突，我们都所见略同，互相支持。知遇之情和

彼此的忠诚更加强了思想上的一致。因此,虽然我对此书的内容应负全责,但是,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它应当算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晶。

在此书的撰写过程中,尤其是最后阶段,其他人也提出了建议和批评,惠我甚多。在此,我特别要感谢查夫达·贝亚佐夫、萨尔瓦多·比亚斯科、弗莱德·L. 布洛克、罗伯特·O. 基奥恩、詹姆斯·H. 米特尔曼和乔治·斯皮罗普洛斯。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后,提出了中肯的、有时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意见,迫使我重新思考我对一些论点的阐述,结果等于把全书重写了一遍。也许他们并不觉得重写过的书比前一稿高明多少,但我从这一过程中获益匪浅。约翰·吉拉德·鲁吉以他出色的编辑才能,对别人提出的合理批评去粗取精,自己也提出了许多高见,循循善诱,鼓励并催促我力戒懒惰,精益求精,把著作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杰西·兰金·考克斯一直协助我为本书的写作查找资料,进行研究,为此投入了无数个年头。是她把我艰涩的文字改得较为清晰易懂,也是她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帮我认识到一些批评意见的合理性。凯特·威滕伯格和莱斯利·比亚勒在对我的手稿进行编辑的时候,表现了对作者的自主权的同情和理解,同时又使本书的内容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 xii

我特别要感激已故的伯纳德·格罗内尔。他先是鼓励我把撰写此书的构想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提出,后来,他又向杰弗里·哈罗德和我建议,这样一个庞大的项目需要不止一本书才能完成。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理解,很难想象我们怎么能成功地进行并完成这个项目。

有几个人与此书并无直接的关系,但他们共同帮助了国际公务员出身的我另辟蹊径,进入了学术界,因此而为此书的写作创造了条件。我要特别提到国际劳工组织的总干事戴维·A. 莫尔斯。他知道,自由就是一个人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采取行动,追求内心深处的梦想。雅克·弗雷蒙和肯尼斯·汤姆森帮助我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首次担任全职教师。威廉·福克斯、利兰·古德里奇和赫伯特·迪恩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推荐人。约翰·霍尔姆斯建议我在睽隔 30 年之后重返祖国加拿大。最后,哈罗德·K. 雅各布森多年来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学术工作中的楷模。我愿在此表达对他们各位的感激。

于多伦多, 约克大学

1987 年 2 月

主题

1

生产为一切形式的社会存在创造了物质基础。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努力的组合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包括政治形态。生产产生了行使权力的能力，而权力则决定着生产的方式。本书即是以权力与生产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来研究诠释目前的历史变化。

研究的第一阶段是把广义上的生产归纳为具体的概念，用以表现历史上生产的各种组织形式，即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各种类型。此为第一部分讨论的题目1。下一步则是研究历史上国家和世界秩序结构中权力的具体类型，看它们是如何形成生产关系，又是如何被生产关系的形式所决定的。这是第二部分的论题2。

对于这些从历史中提取出来的概念，分别从当时的和历史的这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前者把这些概念看做连贯的整体，后者则着眼于它们内在的那些导致了或可以导致变化的矛盾。对于生产关系的论述着重于生产者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成为阶级形成的基础。在涉及国家时，论述的重点在于阶级结构的嬗变，它预示着国家结构的变化。

2

第三部分使用前两部分中展开的分析方法，对现今的趋势和选择进行分析。今人对这些趋势和选择无法自主决定，但只能在这些条件的范围内缔造未来的历史。国家结构的变化影响到生产关系，对这种变化的趋势的探讨涉及霸权性世界秩序的衰弱。生产关系确定了行使政治权力的条件，对于生产关系走向的讨论则是在不断变化的积累结构的框架内进行的。

这些趋势和走向并非都朝着一个方向。它们有着自己的矛盾。书中对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进行了研究，以图找出它所预示的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结构变化。那场世界经济危机

像一道界限，是位于以往清晰可辨的结构和今后尚未分明的结构之间的过渡阶段。未来的结构将由人来建立，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书的结尾部分把历史中人的因素作为一个集体，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了阶级的组成和由阶级采取政治行动，建立新的国家结构的可能性。

把生产置于中心的地位便直接导致了社会阶级的问题。生产结构造成雇主和工人、领主和农民之间权力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阶级差别的基础。但是，历史上阶级的形成与否还涉及其他因素，在近代史中比较显著的因素包括政党和其他用以激起和引导阶级意识的集体行动的渠道。

在对历史变化的研究中注重对阶级的分析，这种研究方法似乎太老派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受欢迎的社会学理论早已排除了阶级的因素。那些理论认为，政治活动是由个人“行为者”和个人组成的团体所进行的，他们的观点和在决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由“政治文化”所决定。有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早期的工业社会中，阶级可能是冲突和变化的基础和原因，但近年来，它的作用已经不再重要¹。就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了把阶级从现代历史研究中剔除出去的企图。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位激进的批评家鲁道夫·巴罗认为，自从生产力造成了物质的丰富以后，阶级这一概念就已过时，目前真正的社会问题转 3 为唤起人们的觉悟，实现心理上的解放²。来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批评家安德烈·戈尔兹认为，产业工人现在完全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方式，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丝毫没有能力来领导改变社会的运动。他认为，只有从社会中那些超脱于阶级之外，预示了阶级的瓦解的领域中，才能产生消灭资本主义的力量³。

历史事件似乎也证明，阶级已不再重要。人们普遍以为，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以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不再能够容忍大规模的失业。但是，80 年代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失业率飙升，而工人们却不敢有所动作。他们遭受了这么大规模的伤害，为什么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呢？这实际上难道不是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种理论的反驳吗？第三世界近期最暴烈的革命打的是伊斯兰教的旗号，并未提及阶级。只有在本应消除了阶级（尽管国家依然存在）的东欧，才出现了波兰的团结工会这一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之上的反对运动。不过，在其他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尚未出现类似的运动。

这些主张抛弃阶级分析的各种理由，无论是来自理论还是实践，都指出了过去阶级分析这一方法的运用中存在的缺点或不足，可以把它们理解为要求通过进一步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对阶级进行重新思考的呼声。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阶级的形成和瓦解以及阶级冲突；阶级关系为经济和政治、生产和权力提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本书旨在说明，在这个方面，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仍然正确。然而，不能把根据19世纪中期欧洲的社会状况所确定的阶级的定义机械地全盘照搬到20世纪晚期的世界，因为目前的社会阶级状况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 4 为了使阶级分析重新成为一项正确而有用的工具，可以用来了解并试图改变社会，就需要对阶级形成的动力采取新的探讨方法。这意味着以生产为出发点，研究生产的各种不同方式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社会关系，看它们是如何影响各种社会力量的，而这些社会力量则有可能构成国家和世界秩序的权力基础。另外，也要回过头来考虑属于世界秩序和国家制度中的权力如何形成并控制着生产关系的发展。

为了明白政治权力的形式和生产体制的形式如何及为何发生变化，需要找到一种具体的方法来了解掌握各种不同的生产形式和政治形态。历史上持久的生产关系格式和国家形式可确定为典型的类型。典型的类型把历史的运动“定格”，把一种特定的社会实践（如一种组织生产的方式或一种国家的形式）作为概念固定下来，以便同与其他的社会实践相比较、相对照⁴。采用这种方法来确定概念也有助于对一种类型所代表的社会实践中的紧张和冲突进行研究。因此，使用典型的类型和对历史的辩证观彼此之间并无冲突。典型的类型是诠释历史的工具之一。

典型的类型是表现历史结构的一种方法。结构一词的用法多种多样，最好从一开始就讲明它在本书中的含义。有些作家用“结构”来指固有的思想或关系形式，它们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不过是结构的承载者而已⁵。本书并无这样的意思。当然，孩童甫一出生，社会上早已充斥着各种公认的社会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先于个人。然而，这些惯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不管是语言、法律制度、生产体制或是政治制度，都是人的集体活动的产物。本书中使用的历史结构一词指的是由人的集体活动所形成，通过人的集体活动而变化的持久的社会惯例⁶。

- 5 从这些相互联系的历史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权力制度始于世界上劳动

进行的方式。劳动是通过一系列相连的生产关系的结构进行的，每一种结构都是一种权力关系，有些统治性和压迫性较强，有些较为公平均衡。生产不仅通过权力关系进行，而且还创造可以转变为其他形式的权力的资源，这些权力的形式包括财务、行政、思想、军事和警察权力。

然而，先有生产，然后才有权力体系，这只是一种逻辑的推理，因为任何形式的国家都要靠生产来为它提供物质基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上，主要的生产结构如果不是由国家所创立，至少也是由国家所鼓励和维持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要靠自由主义国家来打破商业主义的桎梏。中央计划是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的国家组合主义的产物。在历史上，与其说生产决定了国家的形成，不如说是国家确定了生产的形式。不同形式的国家为何以及如何确定并推行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的格式，这些就是本书将要解释的问题。

每一个社会都包括几种相互关联的生产关系。比方说，除了集中的集体谈判制度以外，还存在着没有工会组织的开放性劳力市场、个体经营和家庭生产；中央计划外围有合作社、个体经营，也有家庭生产；第三世界国家中有工业区，另外还有农民农业生产、生存型农业和城市中有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生产关系。国家从这些生产关系中取一种，把它奉为主导的、最正规的、霸权性的形式。此外，国家还对同时并存的各种其他生产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组织。必须解释清楚国家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因为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社会内部的权力的组织。

在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之间建立的等级制（刚刚说过，这是国家的任务之一）构成了积累的结构。盈余从附属的弱势生产层次流向主导的强势层次。农民、廉价劳力和家庭妇女的劳动为大工业提供辅助，养活6
着大工业雇用的工人。中央计划经济则从农业公社中吸取盈余。现代史中有两大发展方式：资本主义方式和再分配方式。两者的共同特征为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它们取代了先前缺乏扩张动力的方式。资本主义和再分配这两种方式采取不同的积累方法。它们在各种生产关系之间建立的联系格式不同⁷，因此，所建立的吸取盈余的过程也就有所不同。对这两种发展方式的积累机制以及它们各自经受的危机提出解释，就是对这两种社会中权力的形成和运作的说明。

一个社会的生产结构是阶级结构的基础。然而，生产的结构只造成了形成阶级的潜力。阶级是否真正能够形成，取决于影响到人们的意识

的因素。具体来说，它取决于政党组织的形式和政党的发展水平。阶级和政党是生产和国家接触的渠道。它们显示着主要影响力的所在，无论是主要来自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还是来自国家⁸。

阶级结构是国家的基础，也决定着国家的性质。这并非说统治阶级纯粹把国家当做自谋私利的工具，而是说，国家的管理人明白，阶级结构决定了哪些事做得到，哪些事做不到，因此而为国家的行动设定了限制。这是对国家的任务和限制的一般性理解，并不排除在某件事上操纵国家政策，也不涉及某一个“作用者”的某项具体行动。这些任务和限制成了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确定了这些任务和限制的是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谓的历史集团⁹。说明某个历史集团的性质，也就弄清了国家的性质，并且为建立另一个历史集团，再进一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提供了可能性¹⁰。

7 生产关系、阶级和历史集团的组合并不孤立地存在于各个国家之内，而是与世界秩序相连。这个世界秩序既通过国家对它们产生影响，也同它们直接相关。现代史上历次世界秩序之间有着重大的质的不同和结构上的分别。若是认为由于所有的国家间制度都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世界级权威，因而它们实质上就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把问题过分简化，会造成理解上的失误。世界秩序间质的区别影响到战争的性质和发生率、解决争端的方式以及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前一个世界秩序与后一个世界秩序在这些方面的区别由国家和生产的形式所决定，而世界秩序一旦确立以后，反过来又为某种国家和生产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世界秩序间的一个主要分别在于某秩序是否具有霸权性。19世纪中期英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和20世纪中期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都是霸权性的世界秩序。处于它们二者之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在内的那段时间的世界秩序则不是霸权性的。我在这里使用霸权一词，不单纯指一个世界强国的统治，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创立的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广泛的认同，秩序的运作依照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确保主导国和统治阶级能够继续保持它们的无上地位，同时又给弱势团体以一定的满足或得到满足的希望¹¹。在这样一个秩序中，各个国家中的生产通过世界经济的机制彼此相连，并且联入世界的生产体系。主导国中的社会阶级与其他国家中相应的阶级结为同盟。作为各国国家基础的历史集团通过各国社会阶级的共同利益

和共同的思想观点而联系起来，形成全球性的阶级。围绕着国家间体系产生出一个世界性社会，国家也因为需要调整其机制和政策以适应世界秩序的节奏而逐渐国际化。非霸权性世界秩序的趋势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阶级和生产的结构主要以国家为中心。国家使用一切必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手段，来推动并保护某些社会阶级和生产结构的利益。 8

本书概述的权力体系是开放的体系。体系中集结的各种力量一贯倾向于维护现存的结构。如果体系的一个部分发生动乱，可以通过动员起其他部分的力量来予以反制。然而，变化仍然是可能的，也确实在发生。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历史集团和国家的形式，一直到世界秩序的结构，在所有这些层次上，变化都可能发生。这些层次之间有着相互支持的关系，任何变化通常都是通过这种关系而发生的。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描述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权力体系，而是要找出权力体系内最具有利于变化的条件的地方，来为制订一项推动社会和政治转变的战略进行必要的事先准备。

当然，在寻找竞争力量的突破点时，不应低估维护体系的力量。改变的力量如若只孤立存在于某几个国家或某些阶级中，就很容易会被各个击破。因此，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反对力量联盟的可能性上。这样的联盟并非对所有的反对力量照单全收，而是要联合那些在全球体系中彼此之间有一致性的力量。

怀着此一目的，本书集中探讨上述权力体系中的某些战略性环节，即：

- 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格式对于生产者的不同类型（较强和较弱），即阶级基础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 家的不同形式对生产关系的组织、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格式的相对发展速度以及阶级之间权力分配的状况的影响；
- 世界秩序层面上影响着生产结构和国家形式的趋势，尤其是
- 在霸权性世界秩序中的国际分工和国家的国际化；阶级的形成和瓦解及其潜能，这种潜能会改变生产关系、形成新的历史集团、并产生另外的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形式。